

西藏50年

生态卷

徐凤翔 编著

民族出版社



献给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

西 藏 50 年
生 态 卷

徐凤翔 编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 50 年·生态卷/徐凤翔编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1. 5
ISBN 7-105-04457-8

I. 西… II. 徐…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西藏—
1951~2001②生态环境—环境保护—概况—西藏—1951~2001
IV. D619. 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454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75 字数: 190 千字

印数: 0001—4000 册 定价: 19. 8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西藏 50 年》丛书编委会

顾 问：江 平 丹增 拉巴平措 李晋有
李佐民 叶小文 朱晓明 杨候弟
方鹤春 廖祖桂

主 编：丹珠昂奔

副主编：黄 颢 赵建新 高建中 邱立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冯 良 李有明 陈 波 罗 莉
杨 青 耿予方 徐凤翔 曹自强
黄 颢 彭学云

总 序

——辉煌的 50 年

丹珠昂奔

1951 年 5 月 23 日，西藏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

5 月 23 日，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从这一天起，帝国主义势力被永远驱逐出西藏；5 月 23 日，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从这一天起，在西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与西方反共反华势力开始了持续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5 月 23 日，作为一个承载伟大历史事件的重要日子，将永远载入史册！

斗转星移，从 1951 年 5 月 23 日至 2001 年 5 月 23 日，历史已走过了半个世纪——整整 50 个春秋。

新西藏的 50 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人民当家做主，坚持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坚持社会全面进步的 50 年；新西藏的 50 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西藏的伟大实践中取得辉煌成就的

50 年;新西藏的 50 年,是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国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围绕西藏的所谓“主权”、“人权”等问题,不断斗争并取得巨大胜利的 50 年;新西藏的 50 年,也是值得中国人民大书特书的 50 年!

一、实现了历史性的选择

西藏地方从元朝开始归入中国版图。元立帝师制度,设宣政院及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扶植萨迦派,代表中央管辖以西藏为主的整个藏区事务。明承元制,封大乘、大宝、大慈等诸多法王,采取“多封众建”、“因俗而治”政策,设官治藏。清治西藏,力树格鲁派,定制度,明法纪,设驻藏大臣、噶伦制度,维护主权,抗击外敌,体恤僧俗,治理方略更为严密、久远。

然而,自 17 世纪后,随着帝国主义强权在世界范围内的肆虐,尤其是自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和瓜分,西藏地方的内外矛盾也日趋尖锐、复杂。一方面,腐朽的清王朝,对内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割地赔款,奴颜婢膝,卖国求荣,在藏官吏执行清廷旨意,非但不御外敌,反诬抗英军民为“国家罪人”;另一方面西藏人民的反帝保土斗争,风起云涌,前仆后继,爆发了隆吐山、江孜等著名战役。一方面民国之初,军阀割据,相互攻伐,无暇顾及西藏;另一方面,一部分亲英分子趁机搞“西藏独立”,设立所谓“国家”机构,企图从中国分离出去。一方面,外敌入侵,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各地方势力拥兵自保,各怀鬼胎。一方面,西藏人民不满意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企图摆脱这种统治;另一方

面，笃信藏传佛教的西藏人民对共产党、社会主义缺乏了解，心怀疑惧。一方面，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西藏执政上层在选择自己的前进道路；另一方面，这一道路的选择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和干扰，时而内向祖国，时而幻想“独立”……1949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对西藏地方政府驱逐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藏代表的评论，认为：“……驱逐国民党反动政府驻西藏的伪蒙藏委员会代表团，是可以理解的，是应该被赞成的……但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而是透过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野心家，企图利用西藏人民和西藏少数不满国民党反动政府错误的民族歧视政策，挑拨西藏与中国的关系，乘国民党政府陷于四分五裂，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西藏的间隙，趁火打劫，窃取西藏，掠夺中国主权，并实行反共，妄图阻滞或延缓西藏人民和西藏少数民族的获得解放。继续奴役我西藏人民和西藏少数民族，这是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可见，和平解放前的西藏形势已十分复杂。这是近代特殊的世界历史、特殊的中国历史造就的一段特殊的西藏历史。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实现解放西藏地方的战略构想，这一复杂的历史课题，自然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面对西藏之特殊的地域，特殊的民族，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特殊的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矛盾，如何有效地解决西藏问题，从而实现长久的和平和民族间的长远的和睦相处。通过谈判，西藏人民终于选择了

拥护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

这一选择,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关爱西藏的结果,是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藏族政治家们从国家大局和西藏民族根本利益出发,顺应历史潮流所做的明智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不能低估这一历史功勋。

我认为,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注重了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收复;二是西藏虽然人口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将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三是及早进军,“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进入全藏(同上电报);四是自1950年1月确定了和平解决西藏的方针,即进行和平谈判、和平进军,进而实现和平解放。在庆祝签订《十七条协议》宴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和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毛泽东正是从解

放西藏使西藏回归祖国这一国家最高利益出发,又从长远的民族团结和发展进步这一根本目的出发,选择了和平解放西藏这一战略方针。事实证明这是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假如不是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将会对当时和今天留下更为复杂的影响。

二、经过了历史性的跨越

旧西藏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是封建农奴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存在着农奴和农奴主两个相互对立的阶段,占人口 95% 以上的农奴、奴隶,没有土地,没有牛羊,甚至没有人身自由,而人口不足 5% 的三大领主(官家、寺庙和贵族)占有 95% 以上的生产资料。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这一不公正、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高利贷。三大领主是三大债主,用高利贷来盘剥农奴。高利贷是一种残酷的剥削手段。据《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札朗囊色林调查报告》介绍,囊色林共有 107 户农奴,借债的有 79 户,占农奴总数的 73.56%。其债务形式共有五种形式:(1)新债。自身和当年欠的债。是相对祖上欠的债而言。欠这种债的农奴有 66 户,借债总额为青稞 4481 尅,藏银 514 品。(2)子孙债。即祖辈所欠的债。欠这种债的共 60 户,欠债额为青稞 17425 尅,藏银 670 品,占全谿卡欠债总额的 80.45%。(3)连保债。只一例,由康沙巴、强拉厦、强拉路、门中、曲科雪巴、曲科龙巴六户差巴连保,向哲蚌寺的郭莽札仓、同噶、打尔马等债主共借新债、旧债青稞 1323 尅,六户共同负担,有逃

亡的要六户共同赔偿，绝了后也要赔偿。最后导致全部破产。(4)代还债。即破了产的差巴欠的债，由接受逃亡户“份地”的差巴代为偿还。(5)全谿卡均摊的债。在这种债中主要有粮食和藏银两种，其利息为：粮食，政府为借十还十一，即借青稞十尅，到年底还十一尅；寺庙和贵族一般是借七还八，即借青稞七尅，到年底本息共还八尅；一些富裕一点的差巴或堆穷放债的利息为借五还六，即借五尅青稞，到年底本息共还六尅。

残酷的高利贷剥削，使许多差巴在经济上如渡苦海，永无到头之日。比如东嘎宗有一户差巴，在百余年前曾向哲蚌寺的一个札仓借了五尅青稞，还了一百多年，还剩二百多尅。

二是乌拉差役。分为两类，一为外差，一为内差。据对囊色林谿卡 1958 年的调查，外差有 19 种，内差有 23 项，负担十分繁重。一年四季繁多的乌拉差役，使农奴饱受劳役之苦。

三是人身依附关系。三大领主不完全地占有农奴的人身，这是西藏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噶厦政府的谿卡资龙“在 1958 年时，共有差巴、堆穷、牧民、手工业者 83 户，都是人身依附于封建农奴主的。在 26 户差巴中，属于官府谿卡的 15 户（资龙谿卡 11 户，普通谿卡 4 户），属于寺庙的 11 户（萨迦寺米谿卡 5 户，扎什伦布属下多吉登寺 5 户，多吉登和康金札仓合有 1 户）。堆穷不是直属于领主就是在差巴之下依附于领主。在 49 户堆穷中，直接依附于官府谿卡的有 9 户

(资龙谿卡3户,普通谿卡6户),在差巴之下(一般说是某户差巴的堆穷)依附于官府谿卡的有38户(普通谿卡36户),在差巴底下依附于寺庙的有7户(多吉登4户,萨迦米谿卡3户),直接依附于寺庙的2户(萨迦属下寺庙开宗拉卜让1户,康金札仓1户)。直接依附于萨迦贵族江木札仓的1户,贵族昂阶谿卡1户。牧民1户,直接依附于萨迦贵族江木札仓。6户手工业者,分别属于贵族杜素,寺庙谿卡有6个领主”(《西藏社会历史调查》之五,第554页)。

农奴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可以在贵族或部落间进行交换。广大农奴对自己的人身和极其有限的财产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利,而受三大领主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农奴的解放,就没有西藏生产力的真正解放,没有西藏生产力的真正解放,就没有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就一般的发展规律而言,像西藏这样的地方,要从封建农奴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再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确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封建农奴制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对西藏来说没有这种跨越,是历史的公正;有这种跨越,是历史的幸运。我认为:这是辉煌的一步,是关键的一步,是西藏百万农奴久久期盼的一步。没有这辉煌的一步,关键的一步,西藏人民还会受更多的苦,经受更多的磨难。因为这一步解决了三个重要问题:(1)不但解决了西藏的主权回归问题,而且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在政治上翻身的问题;(2)按照民主改革的原则,高利贷、乌拉差役、人身依附关系

的废除已成必然，广大农奴在经济上的枷锁被砸碎，因为那一切已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不容；(3)用科学思想引导社会发展的问題。虽然，经济发展的某些阶段是难以跨越的，但西藏人民从封建农奴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经历了历史性的变革

从西藏来说，在这 50 年中，重要的社会变革有三次：

(1)1951 年，通过和平解放，西藏人民获得新生。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也是一次历史性的变革。这一点上文已述，不再赘言。

(2)1959 年起，经过民主改革的，废除西藏旧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变革。

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西藏的民主改革分两步走：一是“三反”(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奴役)、“两减”(减租、减息)；二是进行土地分配(农区划定阶级成分，实行土地改革)。由于西藏是在发生叛乱的形势下进行民主改革的，因而，中共西藏工委提出了“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地区暂时缓改”的方针。同时，根据农村、牧区、寺庙等不同的改革对象，工委先后制定了若干文件来指导这次伟大的运动。

西藏的民主改革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第一，从精神文化看，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开始进入藏族人的意识形态领域，阶级的概念，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思想，人人平等的思想，公有制的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已逐渐成为主导思想。换言之，马列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在藏传佛教为主导的藏族社会传播，为广大农奴阶级所欢迎、接受、信仰。

第二，从政治制度方面看，已逐渐建立了自治区、专区、县、乡级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了自治区、专区、乡级的党的组织系统；已有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批出自藏族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这在藏族历史上都是全新的，尤其是在西藏地方，许多都是第一次。

第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西藏开始全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这一事业的核心力量，同时也是领导社会主义藏族新文化建设的核心力量。

第四，政、教的分离，使宗教不能再左右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利贷、人身依附关系和乌拉差役的被废除，使贵族文化失去依托，而农奴阶级（被压迫阶级）的文化拥有了社会地位。

可以说，从此开始，社会主义新西藏才真正开始了社会主义新体制的建设。

“文化大革命”是全国人民的灾难，西藏遭受的冲击也是空前的。李维汉同志在《西藏革命的道路》一文中在谈到西藏的“文革”时说：“在十年浩劫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左’的错误发展到了极点。其主要表现如：①搞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伤害和牵连了大量的干部和群众。②在人民公社化和学大寨运动中，不顾西藏实际情况，要求过急，并照搬追求大、公、平均主义、穷过渡、割尾巴单一搞粮食、硬性推行多种冬小麦、少种青稞，以及

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等一套做法，严重束缚和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西藏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使群众生活遭到困难。③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遭到诋毁和否定。民族区域自治流于形式。群众的宗教活动被禁止，绝大多数寺庙被拆毁，重要文物大量散失、破坏。爱国上层人士受到迫害。④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多，效益差，甚至搞无米之炊，造成巨大浪费。所有这些都使西藏人民遭受了苦难，给汉、藏之间的民族关系造成严重创伤。这种‘左’的做法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甚至在三中全会后，在一段时间内，也还没有根本转变。”同时，李维汉肯定了西藏的广大干部所做的工作：“在这十几年中，西藏的党政军和广大干部还是做了许多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的大多数是忠心耿耿为西藏人民服务的。这是不可磨灭、不容抹煞的。只是由于指导思想‘左’的错误，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他们的辛劳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

如何摆脱“文革”灾难，使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对于西藏来说也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这不但要靠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也要靠对西藏问题的准确把握。主要问题是从西藏的实际，从全国工作的高度，处理好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矛盾，把握好西藏的特殊性。这一点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讲得十分入情入理。《纪要》将西藏的特殊性归结为四个方面：“1. 是世界屋脊，高原缺氧，地广人稀，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交通

不便,基本上长期处于封闭状态。2. 过去长期处于封建农奴社会。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统治达数百年之久。在跃进到社会主义以后,历史上遗留下的痕迹依然很深。3. 基本上是单一民族——藏族聚居的地区。藏族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情感和风俗习惯。4. 基本上全体藏民都信仰喇嘛教,宗教在群众中有长期的深刻的影响。”自然、民族、社会、宗教是西藏工作中不能不考虑的特殊因素。忘记了这一点,我们的工作自然要受到挫折。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全国的步伐,西藏人民在努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已登上了新的台阶,短短20年,西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选择计划经济是当时时代的需要,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没有这种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的保证,也很难得到巩固,因此可以说当时选择这一经济体制是完全正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近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路线,此后确定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符合时代要求,是正确的。对于西藏来说,从短暂的计划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是巨大的变革。

四、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经济发展。马列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历来重视发展生产力问题。马列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在夺

取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尅思、恩格斯还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尅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列宁说“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623页)“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增加产品的数量”的目的仍然是解决人民的物质需求问题。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227页)同时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虽然有“文革”的挫折,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毛主席关于“慎重稳进”的方针,党领导西藏解决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问题。西藏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牧业、现代商业、现代通讯信息、现代交通运输业,以及新型的现代城镇的出现和发展,都是在和平解放后的50年中。西藏的现代经济形式和产业的出现、发展,既对今天西藏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21世纪西藏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藏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与整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大格局连在一起的。在高度集中统一的年代里,国家权力是国家运转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权力与民族地区存在着主动轮和从动轮的关系,中国整个经济主体

的发展在带动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因而在经济上,民族地区经济与国家整个的经济咬合在一起,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也得到大踏步的发展。就民族地区的经济而言,国家在这里所起的作用不是外因而是内因,不是客体,而是主体,且具有绝对性和权威性,民族地区的工作既受到民族地区的权力部门工作、政策等指导方面的影响,同时也要受到中央的权力部门的工作、政策等指导方面的影响。

文化进步。和平解放前封建思想和藏传佛教思想在思想战线占主导地位,经过 50 年变革,逐步转变成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主导,文化的内核——哲学思想有了根本转变,实现了指导思想的科学化。其次,新型学校得到普及和发展,不但推广、普及了新型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也初步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的人才队伍(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文化、经济、医药、法律、管理等),且日益壮大,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在社会制度上,实现了由私有制(封建农奴制)到公有制(社会主义)的转变,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实现了政教分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走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人民生活得到根本改善,与和平解放前比较,居民收入、消费水平、营养水平、健康水平、国民文化素质、精神生活、生活环境等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和发展,为世界瞩目。